



大家

徐贲:

经典之外的阅读,是种思想探索(下)

□ 本报记者 徐静

## >> 如何摆脱轻信、自欺,也需要启蒙

齐鲁晚报:倘若我们不会质疑,虚假便有机可乘,随之登堂入室。您曾经撰文“为什么你知道得很多,智慧却很少”,有些人很容易被指尖下的信息迷惑,这种趋向对个人思考能力、公共生活品质和民主政治会造成怎样的危害?

徐贲:轻信和自欺是我们当今社会中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,既可能是因为前面谈到的思想懒惰,也可能是因为缺乏应有的认知启蒙。如何让尽量多的人摆脱愚蠢、轻信、自欺,是当前一项非常重要的启蒙工作。我专门写了一本书,叫《人为什么上当受骗》(待出版),其中涉及到许多常见的“认知偏误”问题。认知偏误经常与我们的情感弱点和自然欲望(虚荣、贪婪、妒忌、仇恨、愤怒、恐惧、骄傲、怨恨)有关联。这些情绪都会使得我们在不理智的

状态下变得轻信和弱智。认知偏误是人在某些情况下的特定思考方式和行为倾向,经常是捷径思维所致,导致推理和判断产生系统性偏误,是发生错觉和自我欺骗的主要原因。伴随理性、逻辑、论证思考过程的种种认知短路、障碍、失灵会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,也是我们容易上当受骗的自身原因。

人在缺乏警觉,思考不设防的状态下,会让自己的认知偏误自动形成思维捷径,造成普遍的个人和集体思维素质低下,也让各种欺骗、谎言、不实宣传有机会在社会中如鱼得水、畅行无阻。

认知偏误多种多样,例如同样一件事,对自己原谅,对他人苛求;许多人这么想,我也跟着这么想(从众效应);处在优秀的团体会比单独看起来更优秀(拉

拉队效应);疑人偷斧(确证偏见)、一动不如一静(当下为好效应);事后诸葛亮(后见之明偏误)、以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(公正世界错觉);记仇不记恩(负面偏误);坏事更会发生在别人身上(乐观偏误);坏事更会发生在我头上(悲观偏误);你要往东,我偏往西(逆反心理);反复宣传,即成真理(可获性层叠);胳膊肘往里拐(部落化偏见);不同意我的观点就是对我有敌意(敌对效应);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(非敌即友偏见)。有谁能说自己从来没有犯过这样的偏误?

认知偏误是人类与生俱来的,是需要克服的,也是可以通过相应的教育和启蒙来克服的。今天学校教育开始重视的“批判性思维”教育就可以成为这样一种启蒙教育。

## >> 人文教育的效果,主要在于如何去教

齐鲁晚报:尽管新作是推荐经典之外的阅读,但您作为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英文系教授,二十余年来一直为本科生开设“经典阅读课”,对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相当了解。随着“通识教育”在国内日渐火热,更多人开始重拾人文经典阅读,如何看待“通识教育”和“人文教育”的区别?

徐贲:对人文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区别,我在《阅读经典: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》一书里做了详细说明,主要是就课程设置和教师来源这两个方面来说的。

在我任教的大学里,人文教育的所有课程都是必修的,学生没有选择。但通识教育的课程,学生可以根据爱好自由选择。现在中国国内大学的通识教育基本上是个“知识拼盘”,参与其中的教师教的还是自己的专业课,不过换个通

识教育的名目而已。

其实,设置人文教育的课程并不难,但是,设置的课程是否能起到人文教育的效果,主要在于如何去教,正如前耶鲁大学校长吉亚玛提所说,“人文教育是公民社会的关键,而教学行动则又是人文教育的关键”。伦敦大学教授凯利在《课程设置:理论与实践》一书里指出,尽管课程可以规定教学目标,但是说到底,教学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在于老师怎么教,教师扮演的是课程“成败关键”的角色。一个大学为全体低年级大学生开设必修的人文教育课,每学期都需要好几十位教授同时上这门课。教授们都来自各个系科,如果学校没有众多具有一定人文素质的教授,是不可能办到的。

人文教育指的是“人的自由教育”,

通识教育指的是“普遍教育”或“一般教育”。除了课程设计和教师,这二者的主要区别是人文教育比通识教育更强调人的自主意识、独立思考和判断以及批判能力。人文教育课的核心是阅读思考,它的教育目标是学以成人。阅读思考要求的不仅是阅读作品,更要在阅读中提出与人有关的价值和意义问题,并细加思考、讨论。在这样的阅读思考课上,如果学生只是阅读文本,而不思考,那么,不管他们阅读多少书籍,也不管他们多么熟悉阅读的内容,这个课都算是一个失败。通识教育课不同,它以传授某种知识为主,虽然有的也会注重思考和讨论,但不可能所有的通识教育科目,尤其是像数学、外语、理化、政治教育这样的科目,都像人文教育课那样把阅读思考摆在独一无二的位置。

## >> 写作是阅读之外的一种学习技能

齐鲁晚报:现在的教育,会告诉学生“多读书自然会写作”,这样的阅读多少有功利的成分。其实,有关学术、艺术、文化的“实用化”在您的书中也有提及,并提到一些知识分子因为看到社会有了某种需求,所以便致力于开发这种需求,这种实用化是必然的吗?

徐贲:我觉得“多读书自然会写作”是一个有误导可能的说法,以前有句老话,“熟读唐诗三百首,不会作诗也会吟”。说的是熟能生巧的道理。古诗读多了,便会模仿、转化、借用、引申,不仅张口就能吟诵,而且自己也会写诗。但是,一般的阅读恐怕没有这个效能,你读了许多剧本,未必会写戏剧,小说、诗歌、论文也都一样。阅读与写作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,更不要说是“自然”的

关系了。

阅读也不是一个人只要认得字就自然会发生的事情,阅读也有门道,需要有人指点,并自己细心体会。会阅读是一种技能,也是一种修养,但是,即便很会阅读的人,也未必很能写作。写作是需要阅读之外另外学习的一种技能。

阅读时,你把零零碎碎的想法存放在头脑里,有时候觉得挺受用,很有体会,但是,一到提笔要把这些想法写下来的时候,就会觉得捉襟见肘,下笔艰难。这是因为,写作使用的书面文字与你头脑中迷迷糊糊的想法是不同的。写作是一个厘清思想,让思想清晰,变得有条理的过程。书面文字使思想能够方便地接受他人持续而严格的审察,书面形式把语言凝固下来,别人可以把它放

在眼前,看清它的意思,找出它的错误,明白它的启示。

写作对写作者的思考有磨练的作用,是思考者对自己思考的进一步要求。思想,也就是思考的内容,是借助写作而变得清晰起来的。我觉得,通过各种可能的方法,包括阅读别人的书面文字,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写作能使人更善于思考,增强人的智能。这是一种人的自我实现,它本身就是一种值得赞许的目的,而不只是为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。当然,许多人是为了别的目的而学习写作的,比如工作总结。今天大学中文系开设的秘书专业、实用文体专业,教的也是一些纯粹技能性写作。这类实用写作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写作是完全两回事情了。

## >> 公共关怀应在读书人中传承

齐鲁晚报:“大众文化跟大众的识字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脱节,人们都普遍识字,但有思想的听众数量实际上却在萎缩”。如今已经很难有哪个知识分子还能对社会产生一致性的影响,面对这种境遇,知识分子应该具备哪些操守?

徐贲:大众文化的兴起与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衰落当然是有关的,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有了读写和理性思考的能力,能够获得他们需要的知识信息,当然就不再需要依赖知识人士来当他们的思想引导。这本来不是什么坏事。这是民众自我启蒙能力的提升。康德说,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。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,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。这种不成熟,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,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,这种不成熟状态是

自己加之于自己的。如今,许多民众有辨别是非和区分善恶的能力,他们有基本的公民权利和维权意识,知道自己的正当权益何在,不是那么容易被忽悠的。

已故北大教授季羨林就很赞许普通人的自我启蒙能力,但他也看到,并非所有普通人都有此能力。他说,如果你是一个有头脑的人,一个正经的善良人,读几篇揭露真相的启蒙文章,你就会自己思考,你就会自我醒悟。如果你是一个糊涂的、内心深处不善良的人,你就根本读不懂启蒙真相的文章,你会认为写文章的人是在造谣,因为你缺乏知识又缺乏常识,你不懂历史又从不读书,你没有逻辑思维。后面这种人自己不思,而且还讨厌和憎恨那些爱思考的他人。他们以高亢的激情代替冷静的思考,以选边站队来代替独立判断。

面对这样的状况,知识分子能有的

操守无非也就是说真话而已,他们会指出和批评反智的现象,但不会奢望以一己之力就能改变这种状况。我最近看到资中筠的一篇文章《不要和不思考的人争论》,她指出,“中国式争论,其实都不是真正的争论,多数都是因为话语的对立,陷入抬杠的尴尬境地”。资中筠女士是1930年出生,这么大了年纪了,还在孜孜不倦地倡导启蒙。我关心那些公共的事情,无非也是想做一点启蒙的工作而已,这其实也不过是一个读书人或知识分子的本分。

公共知识分子是读书人精神的传承者,传承在英语里叫 tradition,经常翻译成“传统”。“传统”并不能表达“传承”的特定含义。传承比传统有更明确的“传递”的意思。公共关怀在读书人中间传递,在代际转换过程中时强时弱,但绵延不绝。它是一个值得读书人传递下去的东西,以前是这样,以后也仍然是这样。



《阅读经典: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》  
徐贲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



《经典之外的阅读》  
徐贲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